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的链式中介作用

董霖[1]

（[1]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拒绝敏感性与同伴疏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网络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方法：调查对象选择的是福建省泉州市某一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共373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的调查工具包含《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量表》、《拒绝敏感性量表》、《亲子同伴依恋量表》的同伴疏离维度和《陈氏网络成瘾量统计表》。利用SPSS25.0对回收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1）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积极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呈现出男生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上的得分高于女生，女生在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上的得分高于男生。

（4）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消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5）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积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结论：青少年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父母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青少年的父母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则会降低青少年的拒绝敏感性，从而减少同伴疏离的产生，最后减少网络成瘾的程度；父母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提高青少年的拒绝敏感性，增加同伴疏离现象的产生，最后提高其网络成瘾的程度。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成瘾，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

The Influence of Adolescent Parenting Styles on Internet Addiction：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DONG Lin[1]

（[1]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further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by studying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373 students in Grade one and Grade two of a middle school in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and the survey tools used included the simplified Family Parenting Style Scale (S-EMBU),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Scale, the peer alienation dimension of Parent-Child Peer Attachment Scale(IPPA) and the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 SPSS25.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covered data.

Results： (1)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jection sensitivity, peer alien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2)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jection sensitivity, peer alien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3)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indicating that boys have higher scores i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than girls, while girls have higher scores in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than boys.

(4)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on Internet addiction.

(5)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on Internet addiction.

Conclusion： Adolescents'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eer alienation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rearing style on Internet addiction, that is, teenagers' parents adopt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will reduce adolescents' rejection sensitivity, thus reducing the generation of peer alienation, and finally reduce the degree of Internet addiction. If parents adopt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it will increase teenagers'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crease the phenomenon of peer alienation, and finally increase their degree of Internet addiction.

Key words: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parenting style, rejection sensitivity, peer alienation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1 网络成瘾

1.1 网络成瘾的相关概念

不同学者对于网络成瘾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大部分学者均对网络成瘾呈消极的态度，认为网络成瘾对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网络成瘾”这一概念最早由 Goldberg 在 1995 年提出，他认为过于沉迷于网络、难以自拔是网络成瘾者的典型特点。

紧接着，Young(1996)等人提出了网络成瘾的四种类型，其认为网络成瘾的含义是个体不能自控的使用互联网的一种行为，在没有客观成瘾物质作用下，导致个体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并且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造成个体的机体功能和社会功能都受损的行为。

国内学者陈淑惠(2003)则认为，网络成瘾的形成主要涉及三个核心症状：强迫性使用、戒断反应以及网瘾耐受性；同时也包括与网瘾相关的两个问题，人际关系与健康问题和时间管理问题。由于本研究的被试对象为中国青少年，基于此，选用陈淑惠的观点作为本研究中“网络成瘾”的定义。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网络成瘾的典型特征、发生率和负面影响等，而近期研究则更多关注网络成瘾的危险因子，探讨其中存在的中介变量，建立心理模型，以研究导致网络成瘾这一结果的相关路径。

危险因子就是在流行病学中，能造成某些特定疾病的出现或因此去世的原因，同时可能与环境或个体有关(马维芬 等, 2013)。针对网络成瘾的危险因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总体而言，可以将危险因子划分为内源和外源两方面。内源包括了低自尊、神经质、敌意、冲动等；外源则包括家庭功能不佳、同伴疏离、课业压力等(王智弘, 2016, 2019；王智弘 等, 2019；国家发展委员会, 2015)。

1.2 网络成瘾的测量

Young(1988)考虑到病态赌博的诊断标准所表现出的病理特征与网络成瘾的表现情况十分相近，据此制定了一种自编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其所包含的 8 个问题均与网瘾的病理特征具备较大相似性。在该量表中，当被试给予其中 5 个或以上肯定回答时，会被判断为网络成瘾者。

基于认知—行为模型，Davis 等人(2002)编制出了《Davis 在线认知量表》，该量表包含了五个维度。使用该量表测出的总分超过 100 或任一维度上的得分超过 23，被试则被视为网络成瘾。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陈淑惠于 2003 年在基于中国本土

的文化背景下，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中文版网络成瘾量表。本研究选用该量表作为研究工具。

2 家庭教养方式

2.1 家庭教养方式的定义与类型

孙蕾等人(2016)的研究认为：家庭环境是对个体发展影响最早、持久、直接的因素之一。关于家庭教养方式的定义，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其研究内容基本一致，均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与孩子在成长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较少发生变化的教养风格。

Darling 和 Steinberg(1993)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传达给儿童的态度和行为所表达的情感，包括教养态度和教养行为。Symonds(1939)提出了两个基本维度，即“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旨在对家庭教养方式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并据此推论不同的家庭教养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心理生理发展，尤其是在塑造其人格特质方面。具体而言，家长对孩子的认可和支持将会使其在情感方面表现较为稳定、和善接纳他人，以及对他人富有同理心的特质；相较之下，那些受到父母排斥与拒绝的子女则可能更易于表现出情感的不稳定，以及强烈的反叛情绪。同时，那些在父母掌控下成长的子女往往展现出自信心不足、胆怯、过于迎合他人的特质，而那些能够让父母在生活中顺从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的个体通常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基于该理论分析，Baumrind(1991)将家庭教养方式进行分类，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分别是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冷漠型。

有学者从父母对子女的具体教养行为出发，提出了包括惩罚、拒绝、过度保护、宽容和偏爱等 15 种具体的教养行为。

2.2 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来源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因素包括父母的人格特质、情绪情感状态等。有研究显示，当父母比较外向、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时，其对孩子的需求更为敏感，并且会表达更多的温暖；而若父母在神经质特质方面表现较为显著，同时还承受更多的消极情绪，则可能倾向于过多关注自身，因而难免会忽视子女的存在，甚至会以惩戒、过度控制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Aken et al., 2007)。同时，父母长期处于高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焦虑、烦躁、压抑等消极情绪则会使其在教养孩子过程中忽略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相反地，会更多地采用谩骂、指责、惩罚等教育方式(Phillips et al., 2017)。

外部因素主要涉及社会文化背景、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Markus 和 Kitayama(1991)提出文化可以分为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身处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父母会更加尊重子女的想法，支持其自主选择性；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父母往往要求孩子尊重权威，服从他人，倾向于维持人际关系。不仅如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会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活动中(Bae & Wickrama, 2015)。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更倾向于采用自主支持的方式教育子女；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父母则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较强的控制力和严厉惩罚，提供较少的情感温暖与支持(Miller et al., 1997)。

3 拒绝敏感性

3.1 拒绝敏感性的定义

Mehrabian(1970)首次对拒绝敏感性进行界定，他将个体对于拒绝的过度敏感看作是一种人格特质，而这种特质具体地表现在每个人身上又各不相同，因此他对拒绝敏感性的概念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界定。他将拒绝敏感性看作个体在社会交往环境中对于还未发生的拒绝产生的深深忧虑或是恐惧的情绪，这种担忧或恐惧会使个体将注意力向消极的期望和事物上转移。

Boyce 和 Parker(1989)则认为拒绝敏感性是在与人交往或互动的过程中对于他人的评价过分重视。而另一些研究者将拒绝敏感性看作机体的内部加工机制，它的工作状态是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变化的过程中而不是保持静止的，因此个体对于他人拒绝的强烈反应程度就取决于拒绝敏感性的水平(Mischel& Shoda, 1995)。

Downey 与 Feldman(1996)认为拒绝敏感性是指个体焦虑地预期信息的负面性、容易知觉拒绝信息并倾向于做出过度反应的程度。同时，其提出了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该模型分析了，在过去曾经遭受他人拒绝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不断降低对于拒绝线索的感知阈限，从而影响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对于拒绝线索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由于 Downey 所提出的定义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整合性概念，且该定义最受认可、使用广泛，因此本研究采用 Downey 所提出的拒绝敏感性定义。

3.2 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影响拒绝敏感性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二个方面。其中，个体因素包含但不限于性别、外貌特征及人格特质等；而环境因素则涉及早期创伤经历、依恋、专制型教养方式、同伴欺负、友谊以及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之间相辅相成，在社交情境中个体因素会对特定的注意、感知和认知处理方式产生影响，而环境作为个体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则对这种处理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和塑造。因此，它们还会产生交互作用共同作用于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的高低(郑沁怡 等,

2022)。

4 同伴疏离

4.1 同伴依恋的定义

青春期又被称为“心理断乳期”。这一时期个体的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附于家庭到逐渐独立，其社会关系也由家庭向同伴过渡，与同伴的联系更为密切(Brown & Larson, 2009)。针对青少年而言，同伴在认知、情感、人格以及行为等方面的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同伴关系在满足青少年社交需求、获得社会支持、感受安全和亲密感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同伴依恋是指青少年与同伴之间建立起来的、双方互有的亲密感受以及相互给予温暖与支持的关系(Buhrmester, 1990)。当个体处于青少年阶段，其与同伴的关系会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这种亲密性的增强不仅能够缓解青少年时期因急剧变化而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个体安全感的健全发展。青少年在学校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同伴关系对于青少年而言显得十分重要。

4.2 同伴疏离的定义

疏离感，“Alienation”，最早被理解为分离、异化的意思。马克思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出现于哲学学科中。其认为“疏离”是一个综合概念，包含了主观的自我疏离和客观的与自然的疏离两个方面。客观层面主要表现为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失控感，而主观层面则涵盖了社会分离与个性丧失等多种因素(李超, 2018)。有学者认为疏离感是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与周围人的关系存在一定逆境或者不适，难以正常地应对人际关系。这时往往会体验到一种分离感，感觉自己与所处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等）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缺乏与社会团体建立有支持或有意义的联系，从而将内在体验泛化到对人生无助、无意义的消极感觉，在心理发展上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闭锁和疏离，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感受和体验未得到满足。其基础是与客体之间的疏远、脱离和不和谐以及集体意识的不强烈(Suarez-Mendoza & Zoghbi-Manrique-de-Lara, 2007)。而同伴疏离是指个体从同伴群体中孤立出来的体验和状态，它直接反映了青少年能否与同伴建立有效联结(Mcginley, 2018)。

5 各变量的相关研究

5.1 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

家庭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的拒绝敏感性。拒绝敏感性往往和个体在幼年或青少年时期经常感受到抚养人的拒绝和家庭暴力有关 (Downey,

Feldman, 1996)。Ibrahim (2015)等研究者对 271 名本科生进行了自我报告调查，发现成人在童年时期对父母的接受和拒绝记忆与当前的拒绝敏感性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其中来自同性别父母的接受或拒绝更能够解释拒绝敏感性的差异。这是由于在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中，孩子更容易学习和接受同一性别父母的信仰和行为(Rohner, 2014)。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对于拒绝敏感性有着显著影响(郑沁怡等, 2020)。Erozkan 等人(2009)的研究也发现，相较于其它教养方式，父母实施专制型教养方式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拒绝敏感度最为突出。Cardak, Sarçam 和 Onur(2012)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即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往往会促使其子女产生更高水平的拒绝敏感性。相反，接受比较民主的教养方式的个体则相对不太容易表现出这种不良行为特征。而生活在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个体不仅有着较高的拒绝敏感性，还会产生自卑、压抑等负性情绪，容易出现行为与适应问题，比如网络成瘾。

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产生网络成瘾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了不少研究的证明，但是对其解释则众说纷纭。有研究(汪小平, 2011)显示，家庭的教养方式对个体可能出现的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父母采用何种教养方式及其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是否存在重要的职能缺失，这些因素均会对医学生的网络成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伍静(2016)的观点表明，不同网络成瘾程度的青少年在生活中接受到具有显著差异父母教养方式，表现为高成瘾组会接受更多的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且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在父母情感温暖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不仅如此，也有研究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父亲积极教养方式（情感温暖、理解）与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程度存在显著负相关；而在母亲消极教养方式（拒绝否认）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感觉寻求的去抑制维度起到中介作用(张含博, 2015)。肖童(2022)的研究也表明了，父母拒绝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成瘾。这是由于父母采用拒绝的教养方式，会使青少年无法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自我价值感，从而投向虚拟的网络世界，从而产生网络成瘾的行为。因此，可以得知家庭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包含不同的中介变量。

目前关于拒绝敏感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研究较少。胡乐和余林(2006)认为，若个体具有较高的人际敏感性，则容易产生网络成瘾。拒绝敏感性可正向预测留守中学生的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王江洋, 王蒙歌, 2022)。Weinstein A 等(2016)、郑志怀(2019)的研究结果发现，拒绝敏感性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调节能力，在防止病理性网络使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其还能够在自尊与孤独感中充当中介，从而影响病

理性网络使用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其对于病理性网络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贺雯婷(2022)的研究也证明了拒绝敏感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呈显著正相关。

5.2 家庭教养方式、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的父母教养与子女的同伴关系状况显著相关(Healy, Sanders, & Iyer, 2015)。若父母对子女采用关爱与关注的方式，并且对子女需要的能够及时地反馈，则能够促进其子女在同伴交往中的主动性和信任(Barber & Erickson, 2001)。相反，倘若父亲采用冷漠、拒绝等方式对待子女，则会导致子女在人际交往中表现被动或缺乏主动性(Lamb, 2010)，从而阻碍子女良好同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拒绝敏感性与同伴疏离之间存在密切相关。这是由于拒绝敏感性会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一种自我实现预言的过程(Butler et al., 2007)，即针对于拒绝信息，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会存在自动处理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加剧了个体心目中的消极自我实现预言，进而表现出孤立或回避沟通的行为。此时，当他人感知到了个体所展现的孤立或回避的情绪，会对个体产生排斥或拒绝的反应，从而使得高度拒绝敏感性个体的负面预言得以实现，形成了持续的恶性循环(张莹瑞，李涛，2013)。因此，拒绝敏感性会对个体的人际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有研究(王帅青, 2013)认为，人际关系被认为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而网络成瘾与手机成瘾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不仅如此，有研究(施映竹, 2011;陈慧苓, 2011)认为，同伴关系越疏离的人，就会有越高的网络成瘾。张国华等人(2008)的研究表明同伴的疏离程度与病理性网络使用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即同伴间疏离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往往不愿向自己的朋友寻求帮助解决烦恼，这可能是由于担心会受到朋友的嘲笑而导致的，而选择在网络上进行社交，从而获得友谊与支持。骆延瑞(2022)的研究也表明了在农村初中生这一群体中，同伴疏离可以显著直接预测农村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形成。

网络成瘾的理论模型中的“使用满足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同伴疏离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密切联系。该理论认为，心理需求和动机是个体行为最主要的内驱力，当个体的某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会引发动机驱使其进行补偿。根据 Suler(1999)的研究发现，有 6 种与网络成瘾相关的心理需要，其中人际交往是其中的需要之一。倘若个体在现实中遭到了同伴疏离，其有可能采用网络的形式来使其人际交往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网络成瘾这一现象发生。但是该理论仅探讨了同伴疏离与网络成瘾这两者的关系，未建立起详细的模型，这也是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的原因。

5.3 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的关系

由 Young 于 1997 年提出的 ACE 模型也能很好地解释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A、C、E 三个字母分别代表导致个体网络成瘾三个特点的缩写：A 指 Anonymity（匿名性），意指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有可能通过一系列措施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使其得以被模糊或隐藏，以匿名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受约束，且可以减少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可能；C 指 Convenience（便利性），网络在许多方面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获取各个地区的第一手信息；E 指 Escape（逃避现实），网络世界不同于现实生活，人们可以在网络随意交流，在网络上寻求安慰。

在恶劣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个体，由于所处家庭的支持系统无法及时有效提供无形的帮助，从而减弱了支持系统对那些处于压力状态的青少年的有益缓解功能(肖玉娟, 2022)。当问题来临时，由于青少年会受自身能力的限制，且在消极的家庭教养环境中长大的个体会选择逃避父母的帮助。但是若缺乏家庭的理解和协助，一个人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积压的苦闷。而网络作为一种无需费力便可寻求情感宣泄、规避现实的途径，为这一人群提供了便利。如果青少年与家庭之间存在隔阂，可能会导致他们更依赖网络，通过网络来实现逃避现实，从而产生网络成瘾这一现象(刁生富, 2003)。

并且，家庭教养方式对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会产生影响，消极的教养方式会导致个体产生较高水平的拒绝敏感性。有着较高拒绝敏感性水平的个体，对自己在与现实生活中的他人交往时遭到拒绝有着较高的焦虑水平，其可以通过利用网络的匿名性这一特点，来减少自己在与其他人交往中可能受到的拒绝。不仅如此，倘若个体在现实中经历了同伴疏离，其同样也可以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在网络上结交新的朋友以及利用网络逃避现实的特性，在网络中实现自我需要的满足。

综上所述，在已有的研究中，仅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这四者中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并未建立起确切的模型，这也是本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的原因。

第二部分 问题提出

1 前人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发现现有研究虽然已经相对全面，但在家庭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暂未将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同时作为中介变量，以验证链式中介作用，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将前人研究的不足在研究设计中进行了一定的完善。

2 本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查阅并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探究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以及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其中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更加确切的变量关系研究和中介模型的建立。

3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目前国内已有较多对家庭教养方式和网络成瘾的研究，但尚未有研究同时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的角度来考察家庭教养方式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通过探索泉州某初中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现状，以及各特征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丰富网络成瘾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数据资料。

(2)实践意义：通过对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的调查，引起人们对于家庭教养方式和网络成瘾的重视与关注，同时也能够了解其中的作用机制，更好的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4 研究假设

H1：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2：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3：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在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H4：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在人口学变量中的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H5：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消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H6：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积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假设，拟建立的链式中介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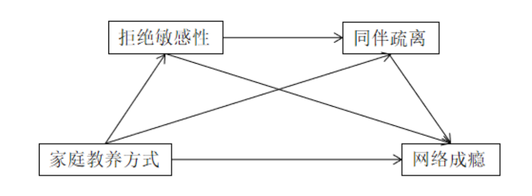


图 1 链式中介假设模型图

第三部分 研究方法

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泉州市某初中(初一、初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456 份，去掉家庭类型中属于单亲家庭、不认真作答（注意力检测题做错）等问卷，回收整理有效问卷 373 份，有效率为 81.2%，所有被试年龄在 12-1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4.04 岁。

本研究获得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应用心理系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审批编号： FZU-PSY2023-0070）。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N=373)

		人数
性别	男	186
	女	187
年级	初一	166
	初二	207
是否独生	是	66
	否	307
居住地	农村	37
	城镇	336

2 研究工具

2.1 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量表

采用在 Arrindell 等人(1999)的基础上, 蒋奖、鲁峥嵘和蒋苾菁等学者删减并简化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基于我国国情, 研究者们对这份问卷进行了修订, 修订出包含父母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核心维度的中文量表。量表分为父、母两个板块，各有 21 个条目，共计 42 题。问卷采用 4 点评分，第 15 题为反向计分题，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参考前人研究，从积极教养方式与消极教养方式的角度展开分析(李永占, 2018)，父母情感温暖维度用以评定积极教养方式，父母拒绝、过度保护维度用以评定消极教养方式，分值越高表示父母使用此种教养方式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2.2 拒绝敏感性量表

采用李霞对《期待拒绝倾向性量表》进行翻译修订后的版本，一共 18 个项目，其中 1，2，4，9，10，17 题为反向计分，采用 5 点计分法，1 为“很不同意”到 5“很同意”，分数越高则表示其拒绝敏感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

2.3 亲子同伴依恋量表（IPPA）

IPPA (Armsden&Greenberg, 1987)用于评估青少年与父亲、母亲与同伴的亲密关系，三个分量表均由 25 项题目组成，每个依恋量表可以单独使

用。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测量，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每个分量表都包括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其中，疏离维度测量个体感受到的人际孤立，其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感知到与同伴间的疏离程度越高。参考前人研究，采用同伴依恋量表中的疏离维度对被试进行施测(王玉洁 等, 2022)。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2.4 陈氏网络成瘾量统计表(CIAS)

该量表由陈淑惠等编制，包含 5 个不同维度，分别是：网络成瘾的强迫性上网问题症状（5 个题项）、耐受问题症状（4 个题项）、戒断反应（5 个题项）、人际和健康问题（7 个题项）和时间管理问题（5 个题项），共计 26 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从“极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依次提高。总分在 26-104 区间之内，分值越大，网络成瘾程度越深。得分在 42 分以下者，为正常使用网络者；分值在 42-59 之间的，其网络成瘾程度为轻度；而分值大于 59 分者，其网络成瘾程度为重度。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将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量表、拒绝敏感性量表、亲子同伴依恋量表(IPPA)中的同伴疏离维度、陈氏网络成瘾量统计表，这四份量表进行整合并完善，制成一份适合中国青少年的个体施测的问卷。采用问卷星线下发放问卷的方式，选取福建省泉州市某初中的初一、初二的学生作为被试进行施测。本次研究共三名主试，提前进行主试培训，明确主试职责。发放问卷时，统一指导语，详细讲解填写要求，并且强调保密原则，被试填写结束后收回问卷并发放小礼物。

4 数据处理

完成问卷的发放及数据收集后，借助 SPSS25.0 软件实现数据的提取筛选和统计分析，使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分析检验，并且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对变量进行中介作用分析，以探究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第四部分 结果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对收集的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27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17.83%，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最小值	最大值	*M*	*SD*
积极教养方式	14	56	37.46	8.31
消极教养方式	28	100	50.06	11.47
拒绝敏感性	24	82	56.36	10.80
同伴疏离	7	35	18.10	4.83
网络成瘾	26	104	52.66	13.90

表3 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占比分析

	人数	百分比（%）
正常上网者	81	21.7
轻度网络成瘾者	176	47.2
重度网络成瘾者	116	31.1

根据表 3 可知，正常上网者有 81 人，占比为 21.7%；轻度网络成瘾者有 176 人，占比为 47.2%。重度网络成瘾者有 116 人，占比为 31.1%。

3 各变量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3.1 性别差异检验

对青少年在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下、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的得分在性别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性别差异检验

变量	男(n=186)	女(n=187)	*t*	*p*	*Cohen's d*
积极教养方式	38.49±8.30	36.44±8.21	2.41*	0.02	0.25
消极教养方式	49.91±11.31	50.21±11.65	-0.26	0.80	0.03
拒绝敏感性	56.31±10.68	58.57±10.30	-4.84***	0.00	0.22
同伴疏离	17.41±4.84	18.79±4.73	-2.78**	0.01	0.29
网络成瘾	52.06±13.53	53.25±13.33	-0.86	0.39	0.09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如表 4 所示，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积极教养方式在性别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p<0.05$）。其中，在积极教养方式的维度上，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得分。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性别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0.01$）。具体而言，女生在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表明女生的拒绝敏感性以及其感受到的同伴疏离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3.2 独生子女差异检验

对青少年在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下、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的得分在是否独生子女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独生子女差异检验

变量	独生(n=66)	非独生(n=307)	*t*	*p*	*Cohen's d*
积极教养方式	38.73±8.87	37.19±8.17	1.36	0.17	0.18
消极教养方式	51.80±13.80	49.69±10.89	1.17	0.25	0.17
拒绝敏感性	55.83±9.82	55.96±11.02	0.47	0.64	0.01
同伴疏离	18.56±5.33	18.00±4.72	1.57	0.12	0.11
网络成瘾	52.41±13.62	52.71±13.41	0.62	0.53	0.02

由数据结果可得，青少年被试在

家庭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得分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4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总分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的方法进行相关分析。具体结果由表6可知，父母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两两显著相关。

表6 各变量及其维度的相关分析（r）

变量	1	2	3	4
1 网络成瘾	—			
2 拒绝敏感性	0.37^{**}	—		
3 同伴疏离	0.49^{**}	0.52^{**}	—	
4 积极教养方式	-0.26^{**}	-0.22^{**}	-0.23^{**}	—
5 消极教养方式	0.35^{**}	0.42^{**}	0.43^{**}	-0.41^{**}

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同伴疏离、拒绝敏感性两两相关。具体而言，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同伴疏离、拒绝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而积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同伴疏离、拒绝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由相关分析数据可知，该数据可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及中介模型的检验。

5 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检验

在本研究中，使用由Hayes(2013)编译的SPSS宏程序Process，使用Model6重复采用5000次，95%置信区间。控制性别，以检验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的中介作用。

5.1 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积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路径回归系数结果如表7显示，积极教养方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β=-0.19，$p<0.001$）；积极教养方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同伴疏离（β=-0.95，$p<0.05$）、拒绝敏感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同伴疏离（β=0.49，$p<0.001$）；积极教养方式能够显著预测负向个体网络成瘾的程度（β=-0.16，$p<0.01$）、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能够显著预测正向个体网络成瘾的程度（β=0.14，$p<0.01$；β=0.39，$p<0.001$）。

表7 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t	β
拒绝敏感性	积极教养方式	0.31	0.09	19.30	-3.78^{***}	-0.19
同伴疏离	积极教养方式	0.52	0.27	46.49	-2.08^{*}	-0.95
	拒绝敏感性				10.56^{***}	0.49
网络成瘾	积极教养方式	0.54	0.29	36.88	-3.45^{**}	-0.16
	拒绝敏感性				2.89^{**}	0.14
	同伴疏离				7.55^{***}	0.39

结果表明积极教养方式能通过四条路径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分别是直接路径：积极教养方式→网络成瘾；间接效应路径1：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网络成瘾；间接效应路径2：积极教养方式→同伴疏离→网络成瘾；间接效应路径3：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

由表8可知，首先积极教养方式→网络成瘾的直接路径显著，效应值为-0.16，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25, -0.07]，表明积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会产生直接影响；其次，间接效应路径1显著，效应值为-0.03，

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06, -0.004]，表明积极教养方式可以对拒绝敏感性进行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可以对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进行正向预测，即拒绝敏感性在积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产生了间接影响。再次，间接效应路径 2 显著，效应值为-0.04，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08, -0.04]，表明积极教养方式可以对同伴疏离进行负向预测，同伴疏离可以对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进行正向预测，即同伴疏离在积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产生了间接影响。最后，间接效应路径 3 显著，效应量为-0.04，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06, -0.02]，即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积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即青少年的父母采用积极教养方式，则不容易使青少年的拒绝敏感性水平提高，进而减少产生同伴疏离问题，最终降低网络成瘾倾向。

表 8 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Effect	Boot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相对中介效应（%）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总效应量	-0.26	0.05	-0.36	-0.16	100.00
直接效应量	-0.16	0.05	-0.25	-0.07	61.54
总间接效应	-0.10	0.03	-0.16	-0.05	38.46
间接效应 1	-0.03	0.01	-0.06	-0.004	11.54
间接效应 2	-0.04	0.02	-0.08	-0.04	15.38
间接效应 3	-0.04	0.01	-0.06	-0.02	15.38

注：间接效应 1：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网络成瘾
间接效应 2：积极教养方式→同伴疏离→网络成瘾
间接效应 3：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

综上所述，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详细的路径模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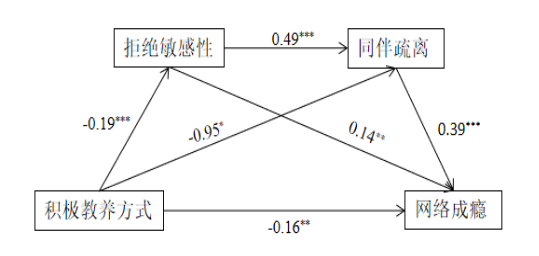


图 2 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积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5.2 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由表 9 可知，消极教养方式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拒绝敏感性（β=0.41，p<0.001）；消极教养方式和拒绝敏感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同伴疏离（β=0.27，p<0.001；β=0.39，p<0.001）；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网络成瘾的程度（β=0.14，p<0.01；β=0.13，p<0.01；β=0.37，p<0.001）。

表 9 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t	β
拒绝敏感性	消极教养方式	0.48	0.23	55.22	9.05***	0.41
同伴疏离	消极教养方式	0.57	0.32	58.70	5.59***	0.27
	拒绝敏感性				8.08***	0.39
网络成瘾	消极教养方式	0.53	0.28	35.40	2.67**	0.14
	拒绝敏感性				2.46**	0.13
	同伴疏离				6.85***	0.37

检验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的链式中介作用，其中性别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消极教养方式能通过四条路径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分别是直接效应路径：消极教养方式→网络成瘾；间接效应路径 1：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网络成瘾；间接效应路径 2：消极教养方式→同伴疏离→网络成瘾；间接效应路径 3：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

由表 10 可知，首先消极教养方式→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路径显著，效应值为 0.14，95%偏差置信校正区

间为[0.04, 0.24]，表明消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会产生直接影响；其次，间接效应路径 1 显著，效应值为 0.06，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01, 0.11]，表明消极教养方式可以对拒绝敏感性进行预测，拒绝敏感性可以对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进行预测，即拒绝敏感性在消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产生了间接影响。再次，间接效应路径 2 显著，效应值为 0.10，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05, 0.15]，表明消极教养方式可以对同伴疏离进行预测，同伴疏离可以对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进行预测，即同伴疏离在消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产生了间接影响。最后，间接效应路径 3 显著，效应量为 0.06，95%偏差置信校正区间为[0.03, 0.09]，即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即青少年父母采用消极教养方式，越容易使青少年的拒绝敏感性水平提高，进而产生同伴疏离问题，最终导致网络成瘾倾向加重。

表 10 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和网络成瘾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Effect	Boot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相对中介效应（%）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总效应量	0.35	0.05	0.26	0.45	100.00
直接效应量	0.14	0.05	0.04	0.24	40.00
总间接效应	0.21	0.03	0.16	0.28	60.00
间接效应 1	0.06	0.03	0.01	0.11	17.14
间接效应 2	0.10	0.03	0.05	0.15	28.57
间接效应 3	0.06	0.01	0.03	0.09	17.14

注：间接效应 1：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网络成瘾
间接效应 2：消极教养方式→同伴疏离→网络成瘾
间接效应 3：消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

综上所述，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详细的路径模型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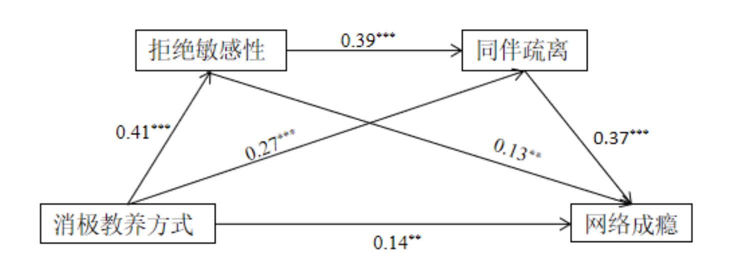


图 3 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第五部分 讨论

1 网络成瘾、拒绝敏感性的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陈淑惠编制的量表及其计分标准，在本研究中被试的网络成瘾占比较高。该数值高于《2022 年青少年网瘾调查报告》中青少年网瘾比例为 14.1%以及钟绎文(2021)研究中的网络成瘾检测率 14.44%。青少年网瘾比例高的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处于后疫情时代，青少年有时候需要使用网络上网课，但是有一些青少年由于缺乏自制力，而无法正确的使用网络，产生了网络成瘾的现象；二是由于青少年拥有较强的好奇心，网络为其探索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青少年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讯息，从而沉迷网络；三是由于青少年正处于叛逆期以及其心理发展具有闭锁性的特点，会逐渐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与父母老师缺乏交流，更愿意在网络上吐露心声，因此在网络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网络成瘾

检测率，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研究者所使用的诊断工具存在差异，导致有关的检出率会有所差异；二、研究中所选取的被试群体有所不同。

拒绝敏感性的平均值较高，高于郭玉华(2022)的研究结果平均分为52.5。拒绝敏感性水平较高这可能存在以下原因：第一，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动荡期，会格外地注意周围的人际关系，对环境中的拒绝线索较为敏感；第二，青少年较多地时间都在学校，进入到了“小社会”，参与到了更多的人际交往。

2 各变量在性别、独生子女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讨论了各变量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这两个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在性别维度上，研究结果发现，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疏离、拒绝敏感性的得分在性别水平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相对于女生，父母对男生更多采用积极教养方式。这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家长以及社会会更加看重男生的成长和成就，男生能够享受更丰富的家庭资源，因此在家庭中，父母双方都对男生会更多地使用积极教养方式。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女生比男生要相对早熟，因此在行为、思想等方面的表现较符合父母的期待(宋琳琳, 2020)，更让父母放心，从而使父母减少了对女生的情感温暖。研究发现，在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这两个方面，女生的得分普遍高于男生。关于其在拒绝敏感性方面的得分高于男性，该结果与以前的研究成果相一致(李洁，2013; 李霞，2007; 王大鹏，2012)。或许可以解释为，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女性在情感层面上表现出更加敏感且精细的特征，在人际交往方面更容易感受到拒绝，并会伴随着相应的担忧和焦虑情绪的产生。并且在东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女性更容易被鼓励表达负面和消极的情感，在社会文化的期待下，女性被允许表现出这些情感。而相对应的，男性则被期望表现出坚强果敢的品质，而对于那些表露出这些负面情感的男性，则被认为是软弱和无能的体现。所以，对于男性来说，表达真实的内在情感存在一定的障碍。在同伴疏离方面，可能是因为就依恋关系而言，女性显然比男性更为细腻和敏感，并且通常缺乏安全感。因此，在平等的同伴交往中，女性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矛盾或误会而疏远同伴，并且也更容易关注一些微妙的细节。因而，男性的同伴疏离得分显著低于女性(张少华, 2021)。

在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同伴疏离、拒绝敏感性、父母教养方式在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原因可能是因为当代生活条件与以前相比较为优越，生活资源充足，并且随着二胎、三孩等

政策实施以及科学养育方式的传播，父母的养育观念发生转变。因此无论个体是否独生，其享受到的父母关注以及投入的资源相当，所以在该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3 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影响的中介模型

3.1 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积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的链式中介

本研究发现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积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原因可能如下：首先，父母采用积极教养方式有利于其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子女在充满温情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会增长其自信心。这会使其在人际交往中充满信心，从而对他人的言语或行为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对拒绝线索较不敏感。其次，低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在与同伴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对于某些中性的线索，并不会表现出过度愤怒、急躁等负性情绪，因此同伴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不会过分担心自己的言语或行为会造成对方的误解，能够更轻松地与其进行交往，能够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最后，拥有较好人际关系的个体，在青少年时期，遇到困难会更愿意寻找同伴帮助，并且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精力，以及交往中可以满足其基本的心理需要，从而减少其投入时间与精力在网络上的可能性。

以往的研究同样能够证明该结果。在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中，父母能够把子女当成独立的个体去理解，给予孩子心理上的开导，有助于孩子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获得良性的同伴关系(田楚瑶, 2022)，从而减少其同伴疏离的可能。并且，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沟通能力、共情能力的发展，在进行同伴交往时产生利他行为(张奇勇等, 2011)，从而能够拥有更好的同伴关系。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父母对孩子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会使孩子学习并模仿到良性的交往模式，从而有利于提升孩子的同伴关系。并且，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体需要满足归属和爱的需要，而青少年在学校生活中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因此良好的同伴关系对于其需要的满足起到巨大作用，从而降低其网络成瘾的可能。

因此，若青少年的父母采用积极教养方式，能够为个体创造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从而使个体不会对现实生活中的拒绝线索过度敏感，与同伴交往中能够创造积极、良性的同伴关系，从而在同伴关系中实现需要的满足，减少网络成瘾的行为。

3.2 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

消极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间的链式中介

本研究发现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消极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原因可能如下：首先，父母采用消极教养方式会使青少年生活在常常被拒绝、冷漠、被忽视、受控制的环境中。根据父母接受—拒绝理论(Erozkan A, 2004)认为，父母和重要他人基于对个体表达的温暖程度可以被放置在接受和拒绝的一个连续体中：温情、情感的父母被归为接受型；反之则成为了带有敌意、冷酷的拒绝型。如果个体在生活里与父母的接触交流过程中，意识到自己被母亲或父亲所拒绝，则有可能受到诸如心理失调等负面的影响，如低自尊、敌意等情况。这样会让青少年内心产生不安全感，对拒绝产生一种预期，从而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得小心翼翼，会去格外注意一些交际线索。其次，因为个体拥有较高水平的拒绝敏感性，会在人际交往中将某些中性线索理解为消极的、负面的拒绝信息，因此对于某些线索会过度曲解，表现出一些过度行为或者情绪，这会使他人感到紧张与迷茫，久而久之会使他人在内心降低与其交往的可能，造成同伴疏离。青少年正处于埃里克森八阶段理论中的青春期，其需要建立自我同一性。倘若个体拥有较高的拒绝敏感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同伴疏离的情况，会使其将注意力以及精力集中于去寻找生活中的拒绝线索，并且由于在人际交往中发生“自我实现”预言的情况，使个体的成长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从而影响其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最后，由于青少年的心理上充斥着成人感与幼稚感的矛盾以及渴望融入同伴团体，但是个体在家庭关系、同伴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需要的满足，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这会使其寻找其他的社会资源以实现需要的满足。当今社会中网络的普及与其便利性为该类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可能会花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网络上，从而造成网络成瘾现象。

以往的研究也能够证明这个结果。李纪英等人(2023)年的研究表明，父母拒绝正向预测拒绝敏感性，即父母越采取拒绝的教养方式，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越高。根据依恋理论，儿童早期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拒绝后会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关系，这种不安全的依恋会使个体感受到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并对他人是否会接受自己特怀疑和焦虑的态度，进而在社会交往中会习惯性的预期拒绝，形成拒绝敏感性；并且，基于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专制、溺爱和忽视教育等不同的消极教养方式普遍会导致子女出现更高的拒绝敏感性；相对地，信任和鼓励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则能减轻子女的对拒绝的反应。此外，父母的养育方式也会部分地通过对子女人格的影响而对其拒绝敏感程度产生影响(高延春, 2014)。

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则是对个体要求无条件满足或者对其需求习惯性忽视，给个体提供了一个受挫的环境，使其自我效能感、自尊的发展均受到阻碍(Liu Z, 2019)，不能和同伴进行良好交往(Guo B, 2004)，从而造成同伴疏离。倘若父母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使孩子学习到拒绝、对抗等消极的人际交往方式，从而提升同伴疏离的可能。那些具备高度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由于对于可能的拒绝反应产生了过度敏感，因此往往更容易受影响，对人际交往会存在一些消极的想法，而出现一些过度反应，表现出愤怒、激动或者回避、低沉的情绪和行为，这样的心理行为反应会使得人际关系困扰程度愈加严重(陈泳霖, 2021)。张国华和雷雳(2008)的研究显示，同伴疏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张耀倩(2021)的结论说明了拒绝敏感性较高的个体在寻求重要他人帮助时，会担心被拒绝，而当真正被拒绝以后，他们便寻求另一种方式满足自己的关系需要。网络作为一种社交媒介，可以减少因人际关系不满带来的负性体验，从而造成网络成瘾。

根据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阿德勒认为补偿机制是个体在社会适应的进程中，对产生的偏差所进行的一种修复性行为。这种修复是一种带有“移位”性质的补偿，即通过在其他方面发挥长处从而赶超他人，用以弥补自身在某一方面的不足。当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其父母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以及经历了同伴疏离，感受到较少的陪伴与交流，从而使其无法满足其基本心理需要。而互联网具有匿名性与逃离现实的特点，为青少年寻找倾诉与互动的对象提供了一个平台，青少年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寻求依恋的群体。同时，通过积极自我呈现的方式，同伴疏离的青少年能够将现实中同伴依恋的失落感移位到虚拟世界进行补偿。但是失补偿理论假定，采用正常目的的上网是个体与网络之间一种良性的互动，个体是可以实现对上网行为的自主把控。但是，当个体怀有一种补偿的、报复性的目的使用网络，此时其他资源难以在成瘾者手中实现有序流动，而网络成为了成瘾者手中的“救命稻草”，从而导致自修复失败，病理性补偿占据支配地位，最终酿成“失补偿”的后果(骆廷瑞, 2022)，从而导致网络成瘾这一行为的出现。

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建立了变量间新的研究模型。前人的研究中，有关于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但并未针对其建立起具体的模型。本研究尝试将这四个变量中建立起链式中介模型，以使得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对网络成瘾的成瘾以及产生路径有清晰的认识。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目前所使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只能够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仍然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引入其他研究方法，以获得更加深入的变量关系的探讨。其次，受制于取样范围和取样方法，样本的代表性不明显，本研究的被试来来自福建省泉州市一所普通中学，被试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且由于初三年级正处于中考准备时期，未纳入被试范围。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收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水平的被试问卷，提升结论的适用性。最后，问卷的题量较大，容易使被试在答题过程中产生疲惫，从而可能会影响结果的说服力以及科学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访谈辅助问卷的形式开展。

综上，虽然本研究探究了父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并证明了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的路径，但是否有其他的中介变量同时起作用，尚待进一步讨论研究。

第六部分 结论

本研究通过调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现状，以及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验证并讨论了所有假设，得出以下结论：

（1）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网络成瘾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积极教养方式、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呈现出男生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上的得分高于女生，女生在拒绝敏感性、同伴疏离上的得分高于男生。

（4）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消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5）拒绝敏感性和同伴疏离在积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以帮助青少年减少网络成瘾的现象，从而实现健康成长：

（1）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养方式不容忽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可以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应该重视科学的教养方式，并多采用积极教养方式，以在家庭中创造一个平等、民主、亲切温馨的氛围，从而有助于个体自信心的发展以及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倘若意识到孩子拥有较高水平的拒绝敏感性，父母应该及时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尽量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从而减少孩子对拒绝线索的过度反应，能够以正确、积极的态度对待。

（2）父母应该关注孩子的同伴关系。这是因为对于青春期的个体而言，其十分珍视同伴关系，同伴的评价以及行为表现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发展，包括对自我的认识、言行举止等。根据观察学习理论，孩子会学习并且模仿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以及行为，因此对于青少年父母而言，其需要重视自身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帮助孩子掌握良好的人际交往技能。

（3）孩子的心理需求受到父母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基本需求包括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对此，父母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与关怀。不仅如此，对于青春期的个体而言，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与同伴。若在遇到困难时其无法寻求到帮助，则可能会采用网络作为其解决困难烦恼的途径。父母应该尽量使孩子能够在家庭中实现该需求的满足，使孩子对家庭拥有较强的归属感，能够在温馨、充满支持的家庭环境中实现个人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

（4）青少年需要学习正确的人际交往方式与技能，对拒绝坦然接受，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在人际交往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某些拒绝，对于个体而言，需要对拒绝正确地看待以及进行科学的归因，培养一定的“钝感力”。

（5）青少年需要善于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社会支持。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与父母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在遇到困难时学会向他人求助。对网络应该拥有清晰的认识，做到科学上网，网络在一方面可以作为有效便捷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也会引人沉迷，从而影响到某些正常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陈慧苓. (2011). *青少年网路成瘾评估模组之初探*. 硕士学位论文.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谘商学研究所.

陈淑惠. (2003). 中文网路成瘾量表之编制与心理计量特性研究. *中华心理学, 45*(3), 279-294.

陈泳霖. (2021). *拒绝敏感性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心理弹性和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刁生富. (2003). 论网瘾的成因与对策.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06), 50-53.

高延春. (2014).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拒绝敏感性的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郭玉华. (2022). *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关系：拒绝敏感性和孤独感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贺雯婷. (2022). *大学生拒绝敏感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及团体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

胡乐, 余林.(2006).网络成瘾成因机制的理论模型及其多因素研究. *中国临床康复*(26), 126-129.

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许燕. (2010).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中文版的初步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1), 94-99.

蒋立杰, 王欣. (2001). 大学生自我概念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442–444.

金灿灿, 邹泓. (2013). 父母监控与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人格类型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06), 63–68.

李超.(2018).*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疏离感、心理韧性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

李纪英, 刘小群, 王铮. 父母拒绝与大学生精神病性体验的关系：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12.

李洁. (2013). *硕士研究生自尊、拒绝敏感性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李涛, 张兰君. (2004). 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研究. *心理科学, 27*(3), 662–663.

李文福, 贾旭卿, 李功迎, 张庆林. (2021).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手机依赖：自我控制和感觉寻求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7*(5), 8.

李霞. (2007). *拒绝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

李焰, 王倩倩, 刘丹, 于建平. (2014). 父母教养方式、自尊和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1), 1715–1718.

李永占. (2007). 城市高中生网络成瘾状况与相关因素.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17), 3326–3329.

李永占.(2018).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 (05),576-585.

廖小燕. (2022). 父母教养方式与中职女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自控能力的调节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刘丹霓, 李董平. (2017).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自我弹性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检验.*心理科学*, *40*(6), 1385–1391.

刘磊, 李文静. (2013). Kimberly S.Young 关于网络成瘾的 15 年研究述评. *理论观察*(07), 23–27.

陆遥, 何金波, 朱虹, 吴思遥, 蔡太生, 胡献, 等. (2015).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进食障响：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3), 473–476.

骆廷瑞. (2022). *农村初中生同伴依恋对网络成瘾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江西农业大学.

马维芬, 杨芝菁, 陈玉夏. (2013). 严重精神疾病前驱期高危险群之筛检预防议题分析. *护理杂志, 60*(3), 98–104.

施映竹. (2011). *儿童网路成瘾评估模组之建构及其实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宋琳琳. (2020).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

孙蕾, 王苏, 盖笑松. (2016). 积极养育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启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 213-217.

田楚瑶. (2022). *高年级小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同伴关系：父母心智化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王大鹏. (2012). 大学生拒绝敏感性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研究.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14*(05), 102-104.

王江洋, 王蒙歌. (2022). 拒绝敏感性与留守中学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污名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2), 219-225.

王帅青. (2013). *初中生人际关系与自尊、人格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

汪小平. (2011). *家庭教养方式与医学生网络成瘾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王旭江. (2018).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危害及对策分析. *才智(22)*, 150–152.

王玉洁，窦凯，聂衍刚.(2020).同伴疏离与青少年社交焦虑：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教育导刊*(07), 39-43.

王智弘. (2016). 危机即是转机：从危机干预谈网路成瘾的危险因子. *台湾心理谘商季刊, 8*(1), 6–15.

王智弘. (2019). 谘商实务的本土化探究：以心理健康危险因子检核表为例. *本土谘商心理学学刊, 10*(3), 6–20.

伍静. (2016). *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人际信任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湖北大学.

武艳钦. (2021).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社会适应性的影响：拒绝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下）*, 716–717.

肖童. (2022). 父母拒绝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心理弹性与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03)*, 56–58.

肖玉娟. (2022).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成原因及对策探析. *心理月刊, 17*(18), 228-231.

岳冬梅. (1993). 父母教养方式：EMBU的初步修订及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7*(3), 97–101.

张国华, 雷雳. (2008). 青少年的同伴依恋自我认同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05)*, 454–455.

张含博. (2015).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感觉寻求、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张梦柔, 张文华, 郭英, 索涛. (2021). 家庭教养方式对中职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0* (7), 1111–1117.

张奇勇, 李庶泉. (2011).家庭教养影响儿童同伴关系的路径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2)*, 240-243.

张少华. (2021). *初中生同伴依恋、心理一致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张耀倩. (2021). *大学生手机依赖和社交焦虑的关系：失眠和拒绝敏感性的链式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大学.

张莹瑞, 李涛. (2013). 拒绝敏感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11)*, 1939–1948.

赵月鹏. (2022). *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郑沁怡, 胡娜, 丁雪辰. (2020). 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基于“个人×环境模型”. *应用心理学, 26*(01), 83-96.

郑志怀, 陈明, 王蒙, 严建雯. (2019).

拒绝敏感性与大学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关系：自尊和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2)*, 1890–1894.

钟绎文. (2021). *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与手机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Aken, C. V. , Junger, M. , Verhoeven, M. , Aken, M. , Dekovi, M. , & Denissen, J. . (2007). Parental personality, parenting and toddlers' externalising behaviours. *John Wiley & Sons, Ltd*.(8).

Armsden, G. C., & Greenberg, M. T. (1987).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6*(5), 427–454.

Bae, D. , & Wickrama, K. . (2015).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linking mechanisms of family processes and adolescents" time use.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5*(7), 1014-1038.

Barber, B. K., & Erickson, L. D. (2001). Adolescent Social Initiative Antecedents in the Ecology of Social Connection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6*(4), 326-354.

Baumrind, D. (1991).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1).

Boyce, P, Hickie, l., Parker, G., Mitchell, P, Wilhelm, K, & Brodaty, H. (1993). Specificity of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o non-melancholic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2).101-105

Brown, B. B., & Larson, J. (2009). *Peer relationships in adolescence*.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Buhrmester, D. P. . (1990). Intimacy of friendship,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during preadolescence and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1*(4), 1101-1111.

Butler, J. C., Doherty, M. S., & Potter, R. M. (2007). Soci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sensi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3*(6).

Çardak, M., Sarıçam, H., & Onur, M. (2012).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University Students.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3), 487-496.

Davis, R.A., Flett, G.L.,& Besser,A.(2002). Validation of a new scale for measuring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mplications for pre-employment screening.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5*(4), 331-345.

Downey, G., &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6), 1327-1343.

Downey, G., Mougios, V., Ayduk, O., London, B. E., & Shoda, Y. (2004).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the defensive motivational system: Insights from the startle response to rejection cu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10), 668–673.

Erozkan, & Atilgan. (2009). Rejection sensitivity levels with respect to attachment styles, gender, and parenting styles: A study with Turkish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7*(1), 1-14.

G, D., & I, F. S.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6).

Goldberg, I. (1996).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191*, 1372-1376.

Garbarino, J. (2008).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communities: Theory,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6).

Hayes, A.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51*(3), 335-337.

Healy, K.L., Sanders, M. R.,& Iyer, A.(2015). Parenting practices,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bullied atschool.*Journal of Child & FamilyStudies*,*24*(1),127-140.

Ibrahim, D. M., Rohner, R. P., Smith, R. L., & Flannery, K. M. (2015). Adults' remembrances of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in childhood predict current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adulthood.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44*(1), 51–62.

Kardefelt-Winther, D.Problematizing. (2014). Excessive online gaming and its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1), 118–122.

Lamb, M. E. (2010). How do fathers influe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Let me count the ways. In M. E. Lamb (Ed.),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pp. 1–26).

Liu, Z., Riggio, R. E., Day, D. V., Zheng, C., Dai, S., & Bian, Y. (2019). Leader development begins at home:Overparenting harms adolescent leader emerg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4*(10), 1226–1242.

Luterek, Jane A., Harb, Gerlinde C, Heimberg, Richard G., Marx, Brian P. (2004).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survivors: mediator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nger suppress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9*(1), 90–107.

Markus, H. R. , & Kitayama, S. .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Mcginley, M. (2018). Can Hovering Hinder Helping? Examining the Joint Effects of Helicopter Parenting and Attach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Empathy in Emerging Adult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Mehrabian, A. (1970).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measures of affiliative tendency rejection.*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0*(2), 417-428.

Miller, Jane, E., Davis, & Diane. (1997). Poverty history, marital histor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s home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Mischel, W,&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on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Psychological Review*,*102*,246-268.

Perris, C., Jacobsson, L., Linndstr, M. H., Knorring, L., & Perris, H. (1980). Development of a new inventory for assessing memories of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1*(4), 265–274.

Phillips, B. A. , Conners, F. , & Curtner-Smith, M. E. . (2017). Parenting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an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yles,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parental stress.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68*, 9.

Phillips, T. M., Wilmoth, J. D., Wall, S. K., Peterson, D. J., Buckley, R., & Phillips, L. E. (2013). Recollected parental care and fear of intimacy in emerging adults. *The Family Journal, 21*(3), 335–341.

Rainer Romero-Canyas, Geraldine Downey, Kathy Berenson, Ozlem Ayduk, N Jan Kang. (2010).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the rejection-hostility link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1)*, 119–148.

Rohner, R. P. (2016). Introduction to Interperson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 (IPARTheory) and Evidence.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6*, 1–40.

Rohner, R. P. (2014). Parental Power and Prestig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Acceptance and Offspring'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48*(3).

Skinner, H. , Steinhauer, P. & Sitarenios, G. (2000). Family assessment measure (FAM) and 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2)*, 190–210.

Suarez-Mendoza,M.J., & Zoghbi-Manrique-de-Lara, P.(2007), The impact of work alienation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the Canary Is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5*(1).

Suler, J. R. (1999). To get what you need: healthy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5*(2), 385–393.

Symonds, P. M. (1939). Research on 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0*(5), 346–353.

WeinsteinAviv, Ben, A., TimorAyelet, & MamaYaniv. (2016). Delay discounting, risk-taking,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nternet and Video Gaming Disord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5*(4).

Young, K. S. (1996).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11. Toronto, Canada.

Young, K. S. (1997). *What makes on-line usage stimulating? Potential explanations for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15, 1997. Chicago, IL.

Young, K.S.(1998).Internet addiction：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1*(3), 237–244.